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

林甘泉
田人隆
李祖德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

(一九二九——一九七九年)

林甘泉 田人隆 李祖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沈蓉男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

(一九二九——一九七九年)

林甘泉 田人隆 李祖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5 字数 326,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1—18,300

书号 11074·506 定价 (七)1.80元

前 言

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古代史分期，是国内外史学界都很重视的一个问题。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我国学术界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象古代史分期问题那样持久地吸引过那么多人的关注和研究。它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哺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成长。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分期问题的讨论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目前虽然还未能取得一致的认识，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意见分歧很可能要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五十年来的讨论，是不断有所深入、有所提高，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的。为了把这场讨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有必要对以往讨论的历史进行认真的总结：分析一下在各个时期的讨论中提出过哪些问题？不同意见的分歧何在？哪些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或新材料的发现已经逐步得到解决？哪些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此等等。就我们史学工作者来说，如果对以往讨论的历史心中无数，在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时，就不可能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发表意见也难免无的放矢，或者老调重弹。

三十年代，何干之曾经写过一本《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对那次论战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很受读者的欢迎。建国以来，有些同志也曾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作过一些简要的评述，可惜都不够系统和全面。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所涉及的历史内容异常广泛而复杂，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和专著数量十分庞大。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二九至一九七九年的五十年当中，国内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有关论著约在八百篇(部)以上，其中建国以后发表和出版的占三分之二左右。要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进行全面总结，决不是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我们的水平有限，更无法胜任这一工作，因此本书只能说是对五十年来分期问题讨论所作的稍为系统的回顾。我们之所以把它呈献给读者，一则是希望能对年青的史学工作者和广大历史爱好者了解这场讨论的历史有所帮助；二则是想为总结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历史提供一些基本的素材。

本书在介绍各家的分期主张和有关问题的意见时，虽然力求准确和全面，但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篇幅的关系，难免有不少遗漏。我们在书中没有正面阐述自己对分期问题的主张，但对讨论中的有些问题，或者表示了一定的倾向性，或者发表了一些看法，这些都难免有浅陋和错误之处。凡此种种，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书中介绍的论著，截至一九七九年底发表的为止。讨论中不同时期各家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原来的译文很不一致，有的且有错讹，为便于读者查检，统一采用现在通行本的译文。

目 录

上编 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一九二九——一九三七年)

第一章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时代背景·····	3
第二章	郭沫若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1
	一、“殷代——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	14
	二、西周是奴隶社会·····	13
	三、周室东迁前后的社会变革·····	18
第三章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争·····	21
第四章	关于奴隶社会阶段的论争·····	36
第五章	“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 说的批判·····	58

中编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

第一章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重要发展·····	7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有关重要著作相继 问世·····	7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的扩大·····	81
第二章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新解答·····	86
第三章	殷商社会性质讨论的进展·····	91
第一节	范文澜、翦伯赞对殷商奴隶社会的论证·····	91
第二节	郭沫若对殷商社会性质研究的自我批判·····	97
第三节	侯外庐的殷商氏族社会末期说·····	101
第四节	延安史学界关于殷商社会性质的争论·····	103
第五节	胡厚宣的“殷非奴隶社会论”及其引起的 反响·····	108
第四章	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意见分歧·····	113
第一节	西周封建论及其对郭沫若的批评·····	113
第二节	郭沫若对西周奴隶社会说的申辩·····	121
第三节	侯外庐对西周社会性质的见解·····	129
第五章	对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	133
第一节	春秋战国是初期封建社会向更高阶段的 发展·····	133
第二节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时期·····	135
第三节	中国封建化的过程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	142

下编 建国以来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 (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

第一章	若干理论问题的讨论·····	147
第一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再探讨·····	147
第二节	奴隶制的不同形态与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	161

一、“古代东方”和“古典的古代”是两种不同的奴隶制形态,还是奴隶制发展的两个阶段?·····	162
二、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	172
第三节 区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	186
一、怎样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	187
二、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	195
三、围绕“黑劳士”身分的论争·····	200
第四节 封建社会形成的条件和途径·····	205
第二章 商代社会性质的新争论·····	215
第一节 商代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	215
第二节 商代的物质文化特征和生产力水平·····	219
第三节 商代主要生产者的身分·····	221
第四节 商代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228
第五节 人殉和人祭·····	231
第三章 西周社会性质讨论的深入·····	235
第一节 殷周之际社会更迭的性质·····	236
一、周族在灭商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237
二、周灭商是否发生了社会制度的变革?·····	240
第二节 对西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估计·····	247
第三节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	252
第四节 西周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264
一、私有,国有,还是公社所有?·····	265
二、关于井田制的讨论·····	270
三、西周的剥削形态·····	276
第五节 西周主要生产者的身分·····	281

一、西周封建论者对“庶人”和“民”身分的看法·····	282
二、西周奴隶社会论者对“庶人”和“民”身分的看法·····	288
第四章 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的讨论·····	296
第一节 对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变革的不同见解·····	296
一、西周封建论的观点——从领主制向地主制的转变·····	296
二、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说·····	299
三、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说·····	301
四、春秋战国奴隶社会说种种·····	302
五、“两条路线论”者的意见·····	304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305
一、铁器是否已广泛使用·····	306
二、怎样看待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308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的变化·····	313
一、井田制的破坏与农村公社的瓦解·····	314
二、“初税亩”和“作丘赋”的历史内容·····	323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	329
一、对奴隶制关系的不同估计·····	329
二、“公室”和“私门”的矛盾与奴隶、平民的反抗斗争·····	333
第五节 战国时代各国的变法运动·····	343
第六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351
一、“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与阶级分野·····	352
二、孔子与儒家的阶级属性·····	358
第五章 魏晋封建论的崛起与汉代社会性质的讨论·····	365
第一节 魏晋封建论的分期主张·····	365
第二节 汉代的生产力水平与奴隶劳动生产率·····	372

一、对两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估计·····	372
二、两汉的奴隶劳动生产率·····	378
第三节 汉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	382
一、汉代农业中主导的生产关系·····	382
二、租佃制是不是封建制?·····	388
三、奴隶是否是汉代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	392
四、工商业中的奴隶制关系·····	398
第四节 关于两汉奴婢的数量、来源和待遇·····	402
一、奴婢的数量·····	402
二、奴婢的来源·····	404
三、奴婢的待遇·····	407
第五节 汉代的阶级斗争与国家政权的性质·····	411
一、关于小农的地位、命运和农民起义所反映的 社会主要矛盾·····	411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质与汉代政权的阶级属性·····	417
结束语：回顾与展望·····	425
附录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五十年论著目录索引 (一九二九——一九七九年)·····	441

上 编

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一九二九——一九三七年)

第一章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时代背景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建立了黑暗统治，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高举起武装斗争的革命大旗，组织工农红军，创建农村根据地，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从大革命失败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斗争空前激烈的时期。

列宁曾经指出：“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①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革命斗争，也是在政治的、经济的和理论的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这个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②。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所进行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就是党所领导的一场重要的理论斗争，也是文化革命深入和文化反“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四二页。

② 《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横排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第六六二页。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大革命失败以后，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内，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一九二八年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正确的分析，遭到了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的疯狂反对。托洛茨基派、陈独秀取消主义者、改组派、国民党右派，都群起鼓噪，竭力歪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妄图取消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托洛茨基派认为中国革命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他们根本否认土地革命在中国的重大意义。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堕落成了取消主义者；随后又和一小撮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陈独秀在他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宣称，经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已经“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势力已经“变成残余之残余”了。既然中国的社会性质变了，革命性质当然也非变不可。因此他宣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终结”，无产阶级现在只能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下，进行合法运动、议会斗争，而等待将来再去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为了配合这种反革命政治主张，托派分子任曙和严灵峰等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等书，大肆鼓吹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他们以《动力》杂志为阵地，因此也被称为“动力派”。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五九六页。

以“公孙愈之”为笔名的顾孟余，是“改组派”的喉舌。他把国民党右派叫做“腐化的反革命派”，把中国共产党污蔑为“恶化的反革命派”，标榜自己是处在这两者的“夹攻”之中。实际上，他的矛头主要是对准中国共产党的。为了反对土地革命，他极力鼓吹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中国社会的经济构造“是一个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①。

以陶希圣、梅思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御用文人，出版了《新生命》杂志，并以“新生命书局”的名义出版自己的著作，因而被称为“新生命派”。陶希圣胡说什么“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分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②，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士大夫阶级的残余”而没有地主阶级，只有“封建势力”而没有封建制度。他虽然不敢否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却又别有用心地说，“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不单在对外，并且在对内如何消灭从来对国内各民族的传统政策”^③，把实现国内各民族平等的问题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混为一谈。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十年内战期间，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即使是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的地下组织和党所领导的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等进步文化团体，仍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并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托陈取消派的反

① 愈之：《中国农民问题》，载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新生命书局一九三〇年版。

②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一九二九年版。

③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新生命书局一九二九年版。

革命理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党的影响下，出版了《新思潮》等一批进步的学术刊物。

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一科学的理论是不是适用于中国？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究竟是植根于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历史的必然，还是少数人不负责任的恶意煽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究竟有没有共同的规律可寻？这些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因此，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同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又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经过了哪些社会发展阶段。它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亚细亚生产方式；二、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三、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这些问题，在十年内战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究竟是否适用于中国这个重要的问题。其中，象“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战，还与当时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着直接的联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场论战中努力捍卫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给予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那时候，许多由于大革命失败而彷徨苦闷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正是在这场论战中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营养，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看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从而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发生，不仅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自身成长过程中的要求。列宁说，马克思“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①中国历史上经过了哪些社会经济形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诞生之后首先遇到而且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国有非常悠久而又连绵不断的历史，有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弥足珍贵的史学遗产。但是，无论是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不能摆脱剥削阶级的偏见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他们的著作里，历史或者被写成帝王将相的家谱，或者被看作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堆积。他们根本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梁启超，曾经为历史发展有没有客观规律这个问题苦恼过，而终于得出了否认客观规律的结论。他说，他原来“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的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但又感到从社会历史中找不到客观规律，终于认为“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唯不可，抑且不必”。^②另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何炳松也明确说，“世之习史者不谙史学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常规。其言似是，其理实非”^③。对

①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一〇页。

②③ 转引自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载《枣下论丛》，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